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探源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从实际出发,依靠观念先导、体制优势、结构特色和文化底蕴,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使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

【关键词】浙江经济 观念 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结构 区域文化

引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活力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论自然资源,浙江陆域资源贫乏,人均耕地只有 5 分多,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论经济结构,浙江原来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论资本供给,国家投资和引进外资都不多;论区位条件,地处沿海并非浙江独有;论政策环境,浙江也没有享受特殊的优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浙江经济能够脱颖而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浙江经济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率先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机制和社会氛围。

一、观念先导:与时俱进强化精神动力

浙江经济的活力靠的是浙江人的活跃,而浙江人活跃的精神动力,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走在时代前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基础上,率先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在所有制结构和运行机制上较早地突破僵化观念的束缚,开创了“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的波澜壮阔局面。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浙江人进一步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确立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全面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掀起了“改体制转机制、抓投资引外资、搞开放促开发”的新高潮。

党的十五大以来,省委引导全省人民瞄准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确立一系列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思路新观念。全省上下心齐、气顺、劲足、实干,形成了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生动局面。

回顾 20 多年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广大干部群众身上最为突出的,是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奋发有为的自强意识、不图虚名的务实观念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

(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浙江人宁肯苦干,不愿苦熬。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仍然像地下的熔岩,不断地寻觅着喷发的通道。特别是人口与资源矛盾尖锐的温州等地,当时被称为“地下经济”和“黑市交易”的个体工商业就已相当活跃,一些乡村20世纪(下文中“20世纪”均省略)60年代末就有一半以上劳动力外出谋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人的脱贫致富冲动迅速变为创业实践。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为成功的创业者。

为了创业,浙江人四海为家,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不好的浙江农民足迹遍布天南海北、长城内外,忍辱负重,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可以说,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便会兴起市场。创业需要有坚韧不拔的劲头,敢冒风险的胆略。在浙江,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都经历了创业的艰辛,风险的考验。这种敢冒风险的精神突出表现在勇于走出国门去闯荡国际大市场。从南非到俄罗斯,从西欧到巴西,到处都活跃着浙江商人的身影。科索沃战争硝烟未散,浙江人就把生意做到了南联盟;美国的战机尚在阿富汗上空盘旋,浙江人已经把装满商品的集装箱运到了喀布尔。浙江人不仅为脱贫致富而创业,富裕之后照样能吃苦,成功之后更想创大业。一些资产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企业家,在技术改造和扩大生产上一掷千万,自己出门却连差旅费都要精打细算。“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正是浙江许多企业家生活的生动写照。

(二)奋发有为的自强意识

浙江人不奢望天上能掉下馅饼,惯于自立自强。找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企业和个私企业,自己造一个“泥饭碗”;拿不到国家投资的项目,就寻找市场适销的产品;享受不到计划分配的物资,就走南闯北到处采购。改革初期,作坊式小厂和集贸市场就这样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由此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做城里人的梦也是自己圆:自己出钱建农民城。在浙江,曾被人们视为保守、落后的农民,恰恰最少“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他们自求发展,自担风险,自发地进行各种各样冲破旧体制的试验,建设着一个充满活力的浙江。

浙江人的自立精神和自强意识,在遇到困难时表现得更加突出。下岗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遇到困难,不求别人靠自己。在自立自强的奋斗中,浙江人学到了“无中生有”的本领。余姚不产塑料,当地的中国塑料城内却有3000余种塑料制品,成了全国塑料市场价格的“晴雨表”;桐乡不出羊毛,海宁不产皮革,却分别拥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和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但年产胶合板335万立方米,总产值30多亿元,成了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中心。如此种种,被一些专家称为浙江的“零资源现象”。

(三)不图虚名的务实观念

浙江人不尚空谈,踏实苦干,讲求实效。在探索中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于卓有成效的做法,无论别人怎么议论,也决不动摇。面对指责,不屑于争论;面对成绩,也不愿炫耀。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看成分看表现”,着眼于“三个有利于”;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不重形式重实效”,“先生孩子后起名”。务实观念使浙江人抓住了一个个改革机遇,赢得了发展时间,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先发优势。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创业。他们继承前辈“能握微资以自营殖”的传统,凭着几十元、几百元的本钱起家经商或合伙办厂,一分一厘地赚钱。温州农民的“第一桶金”,是靠带着“五把刀子”(剪刀、劈刀、剃刀、螺丝刀和菜刀)走南闯北,从缝纫业、皮革业、理发业、修理业和餐饮业中淘出来的;湖州织里农民打造出“中国童装之都”,是靠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义乌农民今日的富裕,是靠经营小商品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绍兴农民的原始积累,是从“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中流出来的。一大批昔日默默无闻的泥瓦匠、打铁匠、修鞋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在逐步积累创业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搞市场经济的经验,一步步从“草木才子”成长为经营者和企业家。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敢于探索不同的发展路子。改革初期,浙东北地区凭借毗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首先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温台地区继承务工经商的传统,创造了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模式;浙中的义乌从“鸡毛换糖”起步,走出了一条

以商促工、兴商建市的路子;而后,浙西的衢州又依靠“来料加工”,有效地启动了后发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舟山凭借海岛资源优势,大做“渔、港、景”文章。这些从实际出发探索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不仅都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而且通过在实践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正在逐渐走向融合,共同构成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

(四)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浙江人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具有钱江弄潮儿的无畏气概和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在第一轮改革大潮中,他们就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等等。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和更高的层次上弘扬创新精神:东阳市开创了全国水权交易的先河;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第一个对农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省份……。透过这众多的“全国第一”,可以充分看到浙江人持久不息的创新热情。

创新不仅需要个体的勇气,还要有良好的客观环境。浙江各级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默契配合和良性互动,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股份合作制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0年代初、中期,温州和台州的农民发扬当地农村合伙经营和“打硬股”的传统,亲帮亲、邻带邻,创办起“自筹资金、合资合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了个人财产的私有共用。当地党委政府对此采取了不争论、看一看、允许试的态度。1987年又肯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经济性质,给予与集体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同时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企业则顺应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以获得政策支持,使温州、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为工业企业的主体。90年代,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并把许多国有中小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党的十五大之后,省委、省政府进一步鼓励股权向经营者和生产经营骨干集中,鼓励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使它们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永无止境。正是由于浙江老百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较早地确立起了上述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才使他们成为具有内在活力和强大动力的市场主体。正是由于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一次次组织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特别是连续十几年来在全省农村开展有很强针对性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才使他们真正掌握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迁,生动地证明了先进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力。

二、体制优势: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

富有活力的体制是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浙江的体制优势的形成,就在于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政府是三个相互作用的最基本的要素。浙江依靠群众力量积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大力促进市场体系发育,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形成了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获得了先发性体制优势,使浙江经济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一)率先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

浙江经济在体制上的鲜明特点之一是率先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从而奠定了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浙江地处海防前线,从1953年到1978年,累计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为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居全国末位。197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3个百分点。因此,浙江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只能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在80年代,城镇主要发展二轻集体企业,浙北农村主要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浙南地区则冒出了一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广大群众还创造了联户经营、挂户经营、合伙经营、合股经营、股份合作等新形式。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提出“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办、户办)一起转”,支持群众的创业

实践,较早形成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成为市场主体。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个体私营经济由于产权清晰,决策自主,利益直接,权责利内在统一,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能够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因而最具活力,发展很快。从1980年到1998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而个私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达到60%。1998年省第十次党代会以后,省委提出要进一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做到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并且把12名优秀的私营企业经营者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在这些政策激励下,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到2001年,个私经济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3.5%,个私工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近几年浙江外贸出口扩张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2001年,全省出口增幅为18.2%,而私营企业达到139.6%。

90年代,浙江又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扩大投资,并鼓励它们进入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发展领域,形成了一批新型的市场主体。2001年,全省非国有投资达1747亿元,比1998年增长46.3%,占同期全社会投资比重达62.9%。由于大量利用民间投资,短短十年就突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制约。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从医院到养老院,从健身房到体育馆,从娱乐场所到旅游设施,大量的民间资本涌入社会文化领域,对增强这些领域的活力起了重要作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大大加快了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

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使市场主体更具竞争力。随着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浙江各级政府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鼓励上规模的家族制企业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科学管理的方向进行制度创新,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在个私经济发达的温台地区,20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已经经历了从家庭企业到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再到公司制企业的递进,其他地区的公司制企业也在快速成长。到2001年底,全省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已有8.58万家,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集团达200家左右。一些大型民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吸纳社会法人和个人资金,促进了产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已经转向现代企业制度。这种变化标志着浙江民营企业的第二次创业与新的飞跃已经开始,进一步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改制,使其成为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促使国有企业改制,增强竞争力。同时,个私经济所提供的税金、资本和大批就业岗位,为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重组、人员分流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截至2001年,全省16930家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已有16365家进行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多种形式改制。全省国有、城乡集体企业改制面和劳动关系转换面分别达到96.7%和81.9%。全省294家重点企业中,有29.9%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42.5%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大大增强了竞争力和控制力。2001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增长了39.8倍,年均增长17.5%,从全国第23位上升到第16位;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居全国第12位,销售收入居第11位,净资产利润率居第7位。一大批国有企业成了各行业的排头兵,国有经济基本上掌握着全省经济命脉。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在全省电力、通讯、自来水和煤气生产供应业中的比重超过80%,在化学、冶金等资本密集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中超过50%,在电子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中超过40%。

总之,由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浙江培育了一大批多种形式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主体,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了所有制结构,也有效地调整了企业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始终占优势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企业共生共荣,各展所长,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奠定了浙江经济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

(二)大力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

伴随着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快速成长,浙江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浙江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建设市场,搞活流通,以商促工,以商带农,对于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以商品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但为广大企业提供了生产要素和产品销售渠道,更重要的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以专业市场为特色的商品市场空前发达。专业市场以交易某一类商品为主,具有现货批发、集中交易、摊位众多、辐射面广等特点。由于市场内经营者数量众多,单个经营者力量不大,无法操纵价格和垄断市场。买卖双方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信号灵敏地调节着供给和需求。由于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搜集信息的成本较低,加上场内经营者都有固定摊位,欺诈和作弊的可能性较小。通过专业市场推销产品的企业,可以共同分享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所形成的营销规模经济。实践证明,专业市场能够有效地为成千上万中小企业提供销售服务,降低交易费用,是一种与中小企业相适应的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创新。

80年代初,随着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工业品市场。由于商品市场具有“带动一片产业,活跃一地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连带效应,各级政府因势利导,积极规划并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建设市场,促进了一大批“马路市场”转变为现代商城;在用地、税收、信贷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在资金的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供给等方面提供帮助,扶持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行市场的管办分离,制止不正当竞争;鼓励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投诉和仲裁机构、商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提供全面服务,加强行业自律,促进了商品市场健康发展。到2001年,全省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278个,年成交额4652亿元,平均每一万人有1个市场,每个市场成交额平均1亿元以上。其中,超10亿元的市场有78个,超百亿元的市场6个,使浙江成为首屈一指的“市场大省”。作为其代表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连续11年位居全国工业品批发市场榜首,目前拥有50多万平方米营业面积、集中了28大类8万余种小商品。

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蓬勃发展。浙江是资源小省,对要素市场的依赖很大。“设备靠拆旧,技术靠退休,供销靠朋友”,是许多乡镇企业的初创之路。因此,浙江的要素市场较早就发展起来了。它促进了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发达,但大部分个体私营企业长期得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流动资本主要依靠民间信贷,融资渠道一直是制约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在浙江的要素市场中,民间资金市场最先形成。各地积极发展农村金融合作机构,探索并逐步规范民间信贷市场。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台州率先试点,组建了股份制的泰隆、银座等城市信用社。它们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形成了灵活、高效的信贷机制,成为当地个体私营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泰隆城市信用社2000年利润2958万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

浙江新增的就业岗位主要来自个体私营企业,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都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因此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较早。通过积极发展遍布全省城乡的职业介绍网络,不仅为农村富裕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增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渠道,而且吸收了300多万外来劳动力。1997年以来,全省共引进各类人才7万多名,其中2001年引进近2万名,有效地弥补了人才的不足。浙江高等院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少,而企业对多种技术要素的需求越来越多。1981年,浙江省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技术交易会,拉开了技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序幕。1987年,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浙江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有关技术市场的地方性法规。而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技术贸易的政策,加强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各种技术交易展览会、洽谈会、信息发布会频频举行,一些地区建立了技术交易场所,一批技术经营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应时而生,技术合同认定和仲裁员队伍逐步形成。2001年,全省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达31.7亿元,实际交易额远远超过此数。

90年代以来,包括土地转让、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房产交易等的房地产市场在浙江蓬勃兴起,盘活了土地和房产,筹集了巨额资金,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200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超过50%。包括证券交易、企业兼并、股权重组、资产拍卖等的产权交易市场也获得快速发展,为企业的优胜劣汰提供了规范化的市场渠道。

总之,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大重组,使企业和企业群体能够把资源配置到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和行业中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

(三)自觉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

浙江不仅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前列,而且各级政府也能比较自觉地实现角色转换,使之与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相适应,并对它们起促进作用。

努力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发育。浙江各级政府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创造一个政策宽松的“小气候”。改革初期,各级政府对民间的创新活动,大多采取默认、允许、支持的做法,“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挡,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强迫”。从表面上看这是“无为而治”,实际上却是在理论和政策跟不上实践发展的情况下促进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成长的高明之举。当群众创造了某种新的做法,人们有不同认识时,党委政府往往采取不争论、不压制、不扼杀的态度,冷静观察,不作结论,审时度势;当经过观察分析,认为应当基本肯定时,就大胆给予鼓励,加以引导;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某种做法可行,又得到上下认可时,就予以大力提倡和推广,并尽力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促使其健康发展。省委把这些做法概括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坚持从浙江的实际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不照搬;坚持求真务实,少说多做不张扬;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实践,允许试,允许看,及时总结完善,敢于创新不争论。

不断推进自身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实现职能的转换。浙江各级政府较早地意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身需要适时转换角色,从大包大揽、干预企业经营,转到规划、引导、监督和服务上来。凡是该由企业做的、市场能办到的,政府不越位代劳。同时,对建设工程承包、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医药采购等配置稀缺资源的行为,绝大多数实行了公开招标,还权力于市场。政府主要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构筑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的新高地。同时,通过实行以财政贴息为主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环境保护和第三产业发展,有效地调动了市县发展经济、增收节支、开辟财源的积极性。从 1998 年到 2000 年,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贴息资金 25.2 亿元,直接带动银行贷款 500 亿元和社会资金数百亿元。1998-2001 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达 3100 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不过 205 亿元,其余都靠各级地方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金,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通过设立投资公司,出台集资办电、“四自”公路、“五自”水库、供排水一体化收费等政策,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既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又提高了投资效益。“九五”以来,相继完成了“六个一千”工程:一千公里标准海塘、一千公里标准江堤、一千公里高等级公路、一千万人次空港吞吐能力、一千万千瓦发电装机和一千万亩标准农田,而且优化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在克服政府“越位”现象的同时,浙江各级政府积极编织“服务网”和“安全网”。目前,覆盖全省县级以上部门的政府“服务网”已经基本建立。各地普遍设立了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中心和经济环境投诉中心,提高了办事效率。各级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审批制度,科学设置审批职能,规范事权和审批程序,推广“政务公开”,实施权力运行“阳光工程”,大力推行“一门受理、规范审批、限时办结”的审批方式。2000 年以来,省级 50 多个部门共减少审批、审核、核准等总事项 1277 项,总事项和审批事项分别减少 50.6%和 58%,各市县也都至少削减三分之一审批事项,全省还取消了 154 项检查和达标项目的评比。2001 年,浙江率先制定颁布了政府行政审批规章,明文规定政府设置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履行调研、听证、报批等法定程序,接受社会、人大的监督,从而将政府的审批职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财税管理方面,实施了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收支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会计委派制度、“收支两条线”制度等等,保障权力的公正、公平、公开运用,也便于监督和管理。

社会保险“安全网”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到 2001 年,全省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 485.3 万人,企业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 99%以上,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达 391.1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 210 万人,医疗保险人数达 386.2 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做到全部按时足额发放,为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基础。

浙江还在全国率先实行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贫困农民也享受到生活保障。

审时度势,做好规划、指导、调节工作。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是取消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要求政府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省内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好规划、指导、调节工作。近年来,浙江各级政府减少对粮食生产的行政干预,在全国率先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充分拥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引导农民面向市场发展效益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使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进程大大加快,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把加快推进城市化作为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的突破口,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纲要,制订落实配套政策,合理调整行政区划,迅速扩大中心城市,使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提高了城市的文明程度。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施出口市场、出口经营主体、出口产品和出口方式“四个多元化”,鼓励千军万马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制造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促进专业市场开展跨国经营,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空间,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实施“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的“柔性”人才政策,营造聚才、育才、用才的良好环境。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全省普通高校招生人数4年增加了3.62倍,高考录取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以上,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带动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扶优扶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中心城市和经济强县(市)强镇更快发展,同时调整扶贫工作的思路和方式,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努力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实行开发式、开放式扶贫,基本完成了“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并实施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加大了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单位的活力,调动社会力量办文化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文化投入机制,组建了一批有社会影响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大型文化集团,使文化产业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三、结构特色: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

浙江工业发展基础差,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根据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和产业传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小企业办起,从小商品做起,从专业市场建起,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发展区域经济,并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城市化,形成了鲜明的结构特色,从而实现了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一)以小商品为基础,形成小商品、大市场、低成本、高效益的比较优势

浙江经济总量不小,但生产的大都是不起眼的小商品:领带、纽扣、袜子、皮鞋、眼镜、打火机、编织袋、标牌徽章等等。由于产品定位符合农村工业的生产力水平,适应市场需求,因而市场占有率很高,小商品做出了大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生产的532种主要工业产品2000年产量的统计,浙江有336种产品的产量居全国前10位,占被统计产品的63%;其中56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1位,53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13种产品产量超过全国总产量的一半。如今,浙江已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生产基地。依托专业市场和供销大军构成的庞大营销网络,成千上万种小商品从浙江流向全国和世界各地。

小商品生产成本低,不需要大量投资,转产也快,经营风险较小,特别适合千家万户和中小企业生产;小商品生产工艺比较简单,技术要求不高,容易迅速扩散;小商品大多是日用消费品,市场大,更新快,薄利多销,利润总量不小,能带来高回报。所以,农村工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往往从生产小商品起步。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小商品要想获得高回报,必须努力创名牌。如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利润率只有10~15%,而国外打火机一般品牌的利润率为20~30%,著名品牌高达60~120%,一些国外著名品牌在温州定牌生产的价格仅为其销售价格的8%至35%,而价格低廉反而受到反倾销调查。因此近年来,浙江一些企业开始把创建知名品牌和开发专利技术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来抓。2001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的全国293件驰名商标中,浙江以28件居全国前列。浙江有关部门也挑选出100个市场占有率高的工业产品加以扶持培育,打造“浙货”品牌,以进一步发挥小商品、大市场、高效益的比较优势。

(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形成小企业、专业化、大协作的集聚效应

浙江中小企业特别发达。2001年,在全省66万家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9.9%以上,产值占87.8%,这两个比重在全国各省市中都是最高的。小企业创办容易,管理成本低,但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限制,势单力薄,竞争力弱。从这一实际出发,浙江的小企业通常不搞小而全,而是从生产某一产品零部件起步,自发形成细密的分工体系。

诸暨大唐镇是著名的袜业生产基地,共有8000多个家庭企业从事袜业生产,其中有1000家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厂、600家营销商、100家联运商。它们依靠专业化分工协作,环环相扣,使整个大唐镇成为一个庞大的袜业工厂,年产48亿双袜子,产值达90亿元人民币。“中国鞋都”温州通过制鞋业内部细密的分工协作,在确保质量的同时,将成本降低到极限。一位西班牙客商吃惊地说:“这里的专业分工已经细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别人几乎无法竞争。”

集聚在一起的大量中小企业既相互进行质量和成本的竞争,又紧密合作,既注重自身创新,又相互模仿学习。企业之间长期紧密接触,逐渐形成了相互信任的社会网络。这种企业组织结构以最终产品为龙头,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社会化协作为纽带,具有“小企业、专业化、大协作”的集聚效应和“无形大工厂”的规模经济特点,是一种先进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活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化生产系统,是一种与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化生产系统同样重要的经济组织形态。它大大降低了技术壁垒、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有利于引进技术人才,建立健全技术、信息等服务体系和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逐渐发展成具有很强竞争力的生产基地,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大量中小企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区际分工效应,以及有利于知识扩散、信息传播和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创新环境,是浙江经济充满活力、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三)以区域特色产业为支撑,形成小资本、大集聚的整体竞争优势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方式是从“一村(或乡、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生产者之间相互模仿,生产技能和市场信息快速传递,使这类产品的生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经过一次次产品档次的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构成了“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区域特色产业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全省88个县(市、区)中,2000年年产值超亿元的各类特色产业区块共有519处,涉及175个大小行业和23.7万家企业,产值达到5993亿元,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温州143个建制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10亿元的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的60%以上。

在区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正在浙江崛起,一些跨行政区划的大产业区开始自发形成,如以永康为中心,包括武义、缙云在内的五金机械产业区,杭绍甬地区的服装产业区,台州的精细化工、塑料制品产业区,温州的鞋革产业区等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只要加强扶植培育,就有可能发展成世界性的制造基地。

近年来,浙江各地在现有区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积极规划建设各类工业园区,以进一步促进企业集聚,提升区域特色产业的竞争力。据不完全统计,经省有关部门批准的省级特色工业园区已有90个,吸引了上万家企业,总投资超过200亿元;省级乡镇工业专业区达122个,2001年共实现销售收入1925亿元,创利润125亿元,完成出口交货值454亿元,实际利用外资3.8亿美元。一批国家级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也正在建设之中。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了要素集中、企业重组和产业集聚,成为新世纪浙江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趋向。同时,通过大力促进区域化布局 and 专业化生产,积极培育特色农业,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茁壮成长,许多地方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形式,创造出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起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园区。全省已有规模较大的农副产品特色产业区块52个,其中一半以上产值超过10亿元;农业专业之乡49个,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

(四)以专业市场为载体,形成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商品营销网络

浙江的区域特色产业,基本上都是依托专业市场发展起来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是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两

个专业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有 5800 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2 万多家中小企业设点经营,在国内外有数百家分销市场。商城设有 115 个货运站,1200 多辆运输汽车直达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40 多个城市,每日进出货物达 2500 吨。在义乌的国外贸易机构有 200 多家,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名外商常驻义乌采购,直接辐射美、日、韩、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 年出口额达 80 亿元。余姚中国塑料城、湖州南浔建材市场、绍兴染料城等,都是全国同类市场中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生产资料市场。浙江正是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对内带动了周围生产企业群体的发展,对外逐步形成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商品营销网络。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黄金地段和大型商场,甚至每个县城,都有浙江商人,人数达数百万。这个营销网络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带动了经济发展。巨大的商业利润成为民间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寻找新的更为广阔的市场成为浙江企业家的共识。许多进入成熟期的浙江商品,通过升级换代,脱胎换骨,从“走西口”的“丑小鸭”,变成了漂洋过海的“白天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做“洋买卖”。100 多万走出国门的浙江商人,成为浙江产品海外营销网络的节点。

浙江大市场的活力还在于不断变革交易方式和更新交易手段。近几年来,会展、代理制、连锁专卖、统一配送、虚拟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在浙江得到了快速发展。余姚中国塑料城建成宽带电子商务平台后,市场网络拓展到美国、英国、日本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义乌的“中国商埠”网站自 2001 年 10 月开通以来,国内外注册会员已达 5 万多人,拥有商品信息 28 大类 8 万多条,成为“永不闭幕的网上小商品博览会”。浙江不少大型专业市场还广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管理,已有 17 个市场开展了网上交易业务。许多企业也利用因特网发展电子商务,全省有 10 万余家中小企业加入了互联网或局域网,企业的域名、网站、网页以及在线数据库的拥有量均居全国前列。据对全省 1295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调查,到 2001 年 5 月末,有 51.3% 的企业已经接入因特网,37.9% 的企业拥有电子信箱,27.6% 的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依靠现代网络设施,浙江初步形成了一个辐射全球的无形销售网络。

(五)以传统产业为支柱,形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高新技术产业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浙江从农村工业化起步,首选产品短缺而又容易进入的领域,使浙江在短缺经济时期高速发展,较快完成了企业的原始积累。“九五”以来,各级党委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引进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引导科技进步方式由技术引进替代型向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结合型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保持传统优势和形成新的优势相得益彰。自 1999 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每年增长保持 27%,2001 年全省更新改造投资达到 3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2%。科技成果转化率先已达 40%,位居全国前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45% 以上。特别是通过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环保、节能技术,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

为了促进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浙江各地以“围绕特色经济,立足支柱产业,企业主导,市场运作”为原则,大力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健全中小企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组建了绍兴轻纺、永康五金、湖州淡水鱼、嵊州长毛兔、丽水食用菌以及江山蜂产品等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目前全省已建立 83 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试验基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97 家高新技术研发中心,121 家技术开发中心。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不断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初步形成了一大批国内制造中心,并取得了稳定的国际贸易份额。2001 年,全省工业产品产销率达到 97.07%,创近几年来新高,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比重提高到 91.6%。

在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加快的同时,通过大力推动高新技术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实施高新技术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势头亦十分强劲。近几年来,全省移动通信设备、特色软件、精细化工、特色药品等产品快速增长,上规模、上水平的高新技术骨干企业不断涌现,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初步形成,还建立了宁波磁性材料、富阳通信等 5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基地。依托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全省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迅速崛起。目前,全省经认定的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

业达 767 家,比 1995 年增加 3.45 倍,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97 家。2001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 310.5 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 17%。农业高科技园区建设也初见成效,嘉兴、萧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已建成 5 个省级农业高科技园区。

(六)以推进城市化动力,形成大中小城市相辅相依的空间结构

浙江主要靠民间力量发展农村工业,一开始走的是建设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不少地方较早制定了允许农民进城建房开店办厂的政策,迅速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省委、省政府也作出了加强小城镇建设的决策,引导乡镇企业走相对集中、连片发展的路子。浙江的农村小城镇从 1984 年的 178 个,发展到 1997 年底的 998 个。同时,浙江实行的省直接管县的财政体制使县级政府有了较大的财权和较强的经济调控能力,大大调动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重点发展县域经济的“强县(市)战略”。2002 年,在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中,浙江占有 24 席,居全国首位。“强县战略”促使县级政府积极发展小城镇。到上世纪末,以小城镇为载体的浙江县域经济总收入、上缴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均占全省的 80%以上。

但是,这一发展道路也使小城镇过于分散,规模偏小,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较低,以致“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城市化水平比国际上工业化水平相同的国家和地区落后 15 到 20 个百分点。农村工业“低、散、小”,经济运行质量低,竞争力弱,而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第三产业比重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乡镇很难为其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有效的配套服务,它们需要更大的活动舞台。

针对这一情况,省委、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加快推进城市化战略,强化杭、甬、温等中心城市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中心镇,发展各类经济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和工业小区,引导企业、人才、技术、资本向中心城市大规模有序集聚,使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三位一体,向“特色工业园区+现代物流+城市化”三位一体转变。近四年来,浙江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的经济组织功能迅速增强,开始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舞台。城市化的推进加速了人才、技术、知识、资金、信息等要素集聚和人口集中,目前城市经济总量已占全省的四分之三。城市的综合功能日益增强,水、电、路、气、通信等条件不断改善。实践表明,加快城市化进程,对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巨大的综合效应。

四、文化底蕴:务实创新秉承优秀遗产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浙江之所以会迅速崛起,经济社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其深层原因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区域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洋溢着浓郁的商业气息,流淌在老百姓的血液之中,“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土壤就发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全面激活了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使它与当今时代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从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一)“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经商意识和务实性格

浙江在唐代就已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均为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都居全国领先地位。人口超过百万的南宋都城杭州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温州市“其货纤靡,其人多贾”,还出现了被称为“机户”的中国最早一批个体工商户。到了明代,杭州、湖州、温州等地均辖有几十个市镇,小者千户,大者万家以上。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荣的市镇商业活动,形成了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人们普遍追求现世的幸福。到了近代,浙江商人又大批走向上海,对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浙沪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家正统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而古代浙江在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文化发达的土

壤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却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例如,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明确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他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要求“实政与实德双修”,把仁义道德落实到“民利”上,疾呼要“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心学大师王阳明则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思想。这些同儒家正统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的“异端”思想,集中反映了浙江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流。加上浙江历史上书院兴盛,私塾众多,“耕读传家”,尊师重教,各种民间文艺繁荣,使这些思想观念能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心理,形成区域文化传统。

受这种商业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浙江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务实的群体性格。即使在“左”的政策巨大压力下,务工经商活动仍屡禁不绝,并被不少地方的群众看成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市场机制仍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顽强地发挥作用,并与计划控制相抗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凭借对市场、商业、求利的文化认同,同时借鉴经营工商业的历史经验,浙江人迅速掀起了务工经商的热潮,努力发挥市场的功能。他们相信一切能带来实效的办法,以事业的成败论英雄,把成功者作为学习的榜样,对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发展道路不动摇。这就使浙江人能够在全国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并在实践中把民营经济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二)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造就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可耕地少,缺铁、缺煤、缺油,缺大宗工业原材料。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45 种矿产的工业储量潜在价值看,浙江仅为 55.7 亿元,人均 128 元,占全国比重仅为 0.09%,人均资源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 100,则浙江的能源为 0.5,矿产为 4.9,综合指数为全国倒数第三。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浙江人靠辛勤劳作,形成了精耕细作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逐步磨练出了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自立精神、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同时,人口密集造成的生存压力也使许多地方的老百姓淡化了安土重迁的观念,敢于并乐于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这种群体性格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就迅速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四海为家、顽强拼搏的创业实践。浙江人普遍不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别人的扶持,不等待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而是始终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过去那种看别人赚钱就眼红,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的狭隘意识,正在被自主参与、平等竞争的开放胸襟所取代。你经商,我办厂,你富了,我要比你更富,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创业热潮。对于外地客商,也一视同仁,平等竞争,有钱大家赚,不搞地方保护主义。浙江人还有一股志在必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失败了,不怨天,不尤人,放下包袱,从头再来;破产了,不灰心,不丧气,打工赚钱,另起炉灶。没有放不下的架子,没有抹不去的面子,有的是一股愈挫愈勇的韧劲。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一种思路;一个地方没有发展余地了,就换个地方接着干。目前在省外务工经商的浙江人有 300 多万,不仅每年至少带回上千亿资金,而且把浙江经济发展成“浙江人经济”,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三)对外交往的悠久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

浙江靠山临海,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这种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了浙江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有滨海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浙江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也有助于浙江人开阔眼界,形成创新意识。早在先秦时代,浙江就同亚洲不少地区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浙江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其中四处设在浙江。鸦片战争后,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浙江人身处中西汇通前沿,得风气之先。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的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大批浙江人到海外谋生,使浙江成为重要的侨乡,海外华侨成为浙江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纽带。

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在浙江的相互碰撞和交融,使浙江人得以接触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吸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削弱对“独尊儒术”思想体系的盲从,扬弃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增强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学习能力和创新愿望。这种独特的多样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造就了浙江人思想活跃,行动机变,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特点,使浙江成为催生创新思想的温床。

在改革开放年代,浙江人继承发扬了“人性柔慧”的文化传统,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开拓创新精神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浙江在改革中走在前列的重要原因,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力最弱的领域启动,进行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搞一步到位的破旧立新,以尽可能减少社会震动和阻力。在新的市场主体积累了很强实力并充分显示竞争优势后,再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在改革过程中,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原有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绩效决定取舍。在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形式和名称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四)“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商业发达的文化积淀,哺育了浙江人的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

长期以来,浙江人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实践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形成了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外出谋生的传统。这不仅孕育出了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而且培养出了成千上万能工巧匠,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传统。著名的有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个性,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专业性人力资源优势,使浙江人能够在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在改革开放之初便迅速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的创业浪潮,而且使许多地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本土性产业,为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东阳庞大的泥水木匠队伍中,走出了一支现代建筑大军;“百工之乡”永康,崛起为中国五金城;在温州传统制鞋业基础上,诞生了“中国皮鞋之都”;“日出华舍万丈绸”的绍兴,发展成称雄全国的纺织业基地;“红帮裁缝”的故乡宁波,而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服装之都;而柯桥、路桥、虹桥等交易便捷的商贾往来之地,则崛起了一座座现代商城。

浙江历史上活跃的商业活动也形成了文化传统。各地商帮和商业集市都有很强的组织性。明清以来,行会和同乡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十分发达。如义乌的“敲糖帮”就有着细密的组织系统和广泛的联系网络,几百年“鸡毛换糖”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商业习俗,帮助义乌人建起了全国首屈一指的中国小商品城,组织起了辐射全球的小商品销售网络。而在商业组织中形成的讲信用、重情谊、相互帮助、和气生财的商业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小企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中,也仍然发挥着凝聚力。浙江人善于配置资源的企业家才能,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悠久的商业传统。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源动力。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产品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的竞争。而文化的竞争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竞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加快融合甚至一体化的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就是“文化经济”,文化已成为增强综合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浙江是文化资源大省,自古以来文化名人数不胜数。到了现代,浙江又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两院院士中浙江籍的占三分之一之多。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浙江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泉和肥沃的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越来越注重运用“文化力”来推动经济发展,用文化活动来“包装”经济活动,提升经济的品位和价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节庆活动,在浙江就有200多个,居全国之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突破口,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文化发展环境,切实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实力,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把文化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注重发挥文化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努力在服务经济、促进经济中,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文化底蕴正在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结束语

上述观念先导、体制优势、结构特色和文化底蕴四大原因,归结到一条主线,就是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浙江精神”为支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靠千百万人民群众去创造。浙江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是由千百万人民群众依靠自己力量创造出来的民有、民营、民享、民富的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生产者、消费者,而且也是投资者、经营者;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财富的积累者、享受者。浙江的经验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和积极性。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充分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资源,不断扩大生产,努力增加财富,奔向共同富裕。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并且行动起来了,多种经济成分和社会细胞就被激活了,国有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也就生机焕发了。老百姓富裕起来了,省就强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大了,民富和国强也就融为一体了。就这样,浙江形成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的良性循环,经济社会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道理也就硬了;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也就巩固了。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奋斗目标,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更新观念,深化体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发挥文化力的作用,继续保持浙江的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增长质量、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浙江就完全能够提前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并在 2020 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注:本文写于 2002 年,所用数字除注明年份者外均为 2001 年底数字。)

(本系列课题总负责人为陈敏尔、何福清、沈立江。本报告执笔者为蓝蔚青、张仁寿、盛世豪、何显明。郑勇军、解力平、王祖强同志参加了研究提纲的讨论;雷云、姚民声、杨大进、王永昌、刘希平、顾益康、吴敏一、傅上伦、李丹、钱吉寿、高克明、曾骅、郭占恒、鲍洪俊、叶辉、黄平、慎海雄、吴晓波、周荣新、吴建平、冯卫民、谢利根、滕复等同志对本报告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张昕华同志参与了课题的组织工作。浙江省统计局王杰、潘强敏同志为我们核对了统计数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